

张元济与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出版

刘 应 梅

张元济是我国近代很有影响的出版家、目录版本学家和校勘学家。他在编辑出版历史文化典籍,弘扬传播民族文明成果方面所做出的不朽贡献,已经为世人所屡屡称道。而其在收集、整理与编辑出版地方文献工作中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虽曾有人涉及,但却很少专门的论述。本文据《张元济书札》、《张元济诗文》、《张元济日记》、《校史笔记》、《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牋》、《张元济年谱》及相关的研究论著,就有关问题进行系统而简要的论述。

一、抄辑、弄藏地方志

地方志作为中国一种自成系统、自具规模的历史文献,历来就是学者们所关注的珍贵资料。特别是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地方志于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用,更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对于习惯于收藏珍稀罕见书籍的藏书家来说,编纂和刻印于清朝和民国的地方志著作却往往被他们所忽略甚至遗弃。在这种情况下,收藏地方志既有某些有利条件也面临着许多困难,而毅然决然地大规模收集地方志,则需要非常的眼光和魄力。

张元济 1902 年受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之邀加入编辑出版行列,就把收藏包括地方志在内的古代典籍,作为商务印书馆的

一项重要使命来进行。他曾经回顾说:“民国之始,余锐意收集全国地方志。”^①当时之所以下定这样的决心,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为了保存民族文化典籍,使其免遭外流之运。张元济曾经为收购陆氏皕宋楼的藏书而多方奔走,最终却没能挽救其被外族吞食的厄运,张元济对此“每一思之,心为之痛”^②。地方志作为中国各地实情的具体记载,又是一些外国团体及个人觊觎已久的文化典籍,清季以来,除陆氏皕宋楼之外,聊城杨氏海源阁等处珍藏的地方志先后流入了日本,而山东藏书家高翰生所藏的地方志一百多部则流入了美国^③。张元济也许看出了在外族收藏中国文化典籍背后的险恶政治用心,所以就要坚决地阻止这种文化侵略活动的蔓延。在1920年4月17日的日记中,张元济曾提到为美国华盛顿图书馆买进《安徽通志》一部,但在6月17日的日记中,他就记到:“嘱陈铭勋拟通告,各馆停购美国华盛顿图书馆嘱购买之志书。”^④前后两个月内这种态度的变化,似乎也反映出他对保存地方志的责任意识的逐步增强过程。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大量收集地方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编辑出版工作的需要。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辞源》之后,就开始编辑《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和《中国人名大辞典》。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就要借用大量的地方志资料。在这种情况下,以张元济为首的商务决策层,果断地做出了广泛搜罗收购地方志的决定^⑤。而张元济对方志本身价值的认识,也是他立志收藏这类典籍的重要原因。他认为,地方志虽不在善本书之列,但地方志的记述有时比善本书还重要。他曾经这样评价地方志:“今之方志,比于古者列国史书,史以记事,事必责实,而彭善瘡恶之意,即行于其中。”“倘能于赏罚不明之时,而以褒贬代之,是吾夫子修春秋之志也。”^⑥将方志抬升至具含春秋笔法的国史之列,可见他心目中方志的地位。而他对于收藏地方志的贡献还不仅仅在于决策和规划,他直接参与并为具体实施这项文化工程付出了艰辛努力。

张元济的家庭是浙江海盐的一个文化望族，他本人是光绪年间进士，和康有为一道参与了“戊戌变法”，之后入主商务印书馆，拥有相当的学术地位和声望，这特殊的背景和多重身份，使得他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与各方面的人士建立良好的关系。特别是那些饱读诗书、富藏典籍的文化人士，均愿与他交朋友，共同完成某项特定的文化任务。此外，商务印书馆在上海之外许多地方都设有分馆，与各地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张元济当时就充分地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为商务印书馆展开了广泛的方志征集活动。在《张元济日记》中留下了这方面的大量记载。1918年1月16日，张元济给毛契农写信，“托购湘缺志书，又托贵州志书”；1月18日致信伯恒，“寄府县志清单”；1月28日“昨发梁宝田，为志书事”，又发“穆伯勒、郭丽中、陶惺存，均为志书事”；3月26日发信伯恒、沅叔、程雪门、乾三、敬康，“均托购志书”；6月24日为美国“购入《缙云县志》，二元”，为涵芬楼购入“《泾州志》，四角”；6月27日，为涵芬楼购《景州志》；6月29日，又购进《畿辅通志》、《元城县志》、《新城县志》、《唐山县志》、《德兴县志》和《鹤峰州志》；7月1日，购入《黔阳县志》、《分宜县志》。在一年之内，就有这么多次关于购买方志的记载，可见张元济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张元济及商务印书馆对方志的收集目的在藏更在用。因此，为了收集保存资料，他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进行抄补誊录。《张元济书札》和《张元济日记》中，留下了许多他和当时的一些藏书家关于鉴藏、商借、抄录地方志的记载。1923年7月15日致信刘承幹说：“弟十余年来已为（按指东方图书馆）购藏图籍，约可得十余万册。其中以各省方志较为有用。求之于市而不得者则展转借钞。”1922年3月6日和1923年9月10日，先后致信刘承幹说：“近日购得《长洲县志》，系乾隆三十一年沈归愚所纂三十四卷本。此书极为罕见，惜其中缺去卷五至十一、卷廿七至三十。闻尊处前在古书流通处购得一部，倘果纂自一手，刊于同时，拟恳检借所缺卷数，俾

得钞补完足,”“前奉手谕有《广东新兴县志》可以借钞,拟祈转属典守者代为一查。共有几册?总共有若干叶数?并乞示知。”1927年元月4日和1928年4月28日,又在致汪兆镛的信中说:“志乘一门为数较夥,贵省惟开平、开建、感恩三县尚未搜得,兄能为我访觅否?能借钞亦可。拜托拜托。”“《开平县志》仰承说项,得以假钞,感谢不尽。”1931年4月8日致函瞿熙邦(瞿凤起)云:“兹据东方图书馆报告,志书二十四种,业经发抄完竣,应将原书送还,并请续借十种。……至续借志书十种亦蒙允假十余部,不必以十部为限,尤为铭感。”1923年11月12日的日记中说:“赖际熙焕文来谈,知《赤溪厅志》即伊主修。共四册,已脱稿,尚未刊付。即托代抄一份。”此类记载真是不一而足。

由于张元济是一个集学者与出版家于一身的藏书家,所以,他对文化典籍表现出更为开放的交流传播态度。这在他收集、传抄地方志的过程中也有很突出的反映。在1918年6月18日的日记中,他写到“购入《南皮县志》一部,为词蔚所购,价小洋八角。”6月27日的日记天头处,又记为葛词蔚购买《宁远县志》和《昌黎志》。如果说葛词蔚与他有亲家之谊,代其买书似亦在情理之中,那么他对于外人所表现出的同等胸怀,就显得难能可贵。傅增湘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藏书家,他对地方志亦颇关注,在张元济多方收集地方志时,他也在积极地求购。张元济在得到方志出售的信息后,也常常与傅增湘取得联系,互相协商,甚至转让。1930年7月8日,他致信傅增湘说,罗振玉有嘉靖和万历《四川总志》各一部在商务印书馆寄售,“兄如欲得之,乞飞示”。傅增湘1928年12月20日给张元济去信说:“目前急欲遍翻四川府县志,京馆存者不及半,涵芬楼中则尚完富,欲借则卷帙太多,无法运致,南来检抄,苦无此暇,且亦非数日所能了,奈何奈何。”^⑦看到傅增湘如此痴情方志又为此焦躁不安,张元济则把涵芬楼所藏傅增湘需要的四川省方志,一批又一批地寄去,让他从容抄录,又一次表现出他宽广的胸怀。在1930年6

月3日、7月8日、9月5日,1931年3月6日致傅增湘的信中,他都提到了这件事。而傅增湘致张元济的信中对此事的记载,更是迭见。张元济不仅对个人是这样,对国家藏书机构亦持同样的态度,1930年11月22日他致函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说:“承示贵馆所藏嘉靖《江阴县志》及万历《如皋县志》各有残缺,拟借敝馆涵芬楼所藏两种核对钞补。事关流通古籍,自应遵命照办。兹谨将两县志各六册,共十二册,交邮挂号寄奉,即希察收示复为荷。”可见张元济收集方志并不是出于狭隘的个体占有,他着眼的是中华民族的整体收藏。

在张元济的精心谋划和不懈努力下,商务印书馆的地方志度藏达到了一个非常可观的水平。据统计,到1932年商务印书馆的藏书楼即东方图书馆被日寇焚毁前,已藏有各地方志2641种,25682册。内有元本2种,明本139种,省志已全部收齐。全国府、厅、州、县志有2081种,东方图书馆收藏有1753种,品种占全国已有总数的84%。^⑧“搜罗赅备,蔚成巨观,国内殆无伦匹。”^⑨当时收藏如此丰富的地方志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出版机构竟然具有如此繁富的收藏,这与其主事者张元济先生的艰辛努力是分不开的。曾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译的曹冰严说:“涵芬楼所藏善本古籍和全国地方志,多数是张菊生先生亲手征集的。”^⑩可惜的是,这批来之不易的珍藏在1932年1月28日被日本人的炮火全部化为灰烬。数十年的辛勤积累毁于一旦,张元济感到无比悲愤!然而,张元济却没有因此放弃对地方志的收集,他在1934年3月3日和4月4日给方志收藏家任振采的信中,就两次提到借抄《嘉庆一统志》的事:“以前曾向清史馆借得《嘉庆重修一统志》,由商务印书馆发行。正拟出版,突遭‘一·二八’之变。毁去数十页,竟成残本。闻陶兰翁言邨架藏有蓝印本一部,曾托兰翁代乞借抄,并恳令亲杨叔翁介商务分馆施君晋谒。仰蒙延接,并荷发篋,许将藏本携至馆中逐录。”“前商借尊藏蓝印本《嘉庆一统志》抄补残阙,仰承慨允,

遂使坠简阙文顿成完璧。”1937年6月15日又致信叶恭绰说：“康熙十七年《太仓州志》、乾隆十年《镇洋县志》，涵芬楼前均有之，今无一存者矣。思之泫然。闻蒋谷孙藏方志甚多，元济不识其人，或托姚虞琴一商之。”其胪集方志之愿愈久弥烈！

二、乡邑文献的汇辑与出版

汇辑并出版乡邑文献，也是张元济编辑出版生涯中一项十分重要的活动内容。他曾经在1921年7月3日致钱绍桢的信中说：“乡邦文献攸关，援匹夫有责之义，正不宜多让也。”张元济在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一点也不亚于他在收集地方志时所付出的心血。

张元济从事乡邑文献的最大成就，主要体现在汇辑出版嘉兴、海盐先哲著述和海盐张氏著述。

嘉兴府辖治今浙江杭州湾以北的海盐等地区，古称槁李，是明清以来的文化之乡。此前曾有本郡清末藏书家、学者忻虞卿汇集汉魏至清光绪中叶嘉兴府籍人士的著述，成为《槁李文系》四十六卷。但此书未能公开地印行，而且从光绪中叶以来，又有许多乡邦著述出现，需要在增补的基础上，印刷出版。于是，张元济与秀水金箴孙、平湖葛词蔚等人商议，共同发起征集补辑乡邦著述。由于张元济有编辑出版的独特优势，所以在这项工作中，他承担了大量的具体的任务，设定征稿范围、策划编辑体例等等。从他给王甲荣、吕在廷、朱希祖、刘承幹、吴徵、徐棠、张咨三、陆文烜、陈宜慈、陈瀛客、钱绍桢、谈文烜、龚宝铨、葛嗣澎（葛词蔚）等人的信函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为保存乡邑文献而巨细不遗的辛劳程度。

在与金箴孙、葛嗣澎（葛词蔚）的分工中，张元济主要负责海盐地区的工作，所以，他在这一活动中，对于海盐一地的地方著述，又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在1921年12月29日、1922年2月11日、5月30日、9月12日给王甲荣及1929年6月17日致罗家伦的信中，他就多次非常具体地提到了《海盐文献志》和《海盐文献》，并且

在征集这部分文献时也用到他最常用的抄录方法,这又反映了完成这项工作的艰难程度。

张元济的家族是明清两代海盐的望族^①,他的十世祖奇龄、九世祖惟赤、六世祖宗松和六世叔祖宗楠、宗櫟,都是明清以来的著名学者、诗人和藏书家,有以藏书、刻书而名的海盐张氏涉园之称。嘉庆道光之际,江浙名流学者如吴騫、鲍廷博、陈鱣、黄丕烈等,都曾向张氏涉园借书校讎^②。将先德先世的著述及他们刻印、收藏的书籍,重新予以汇辑、整理和出版,这不但是继承祖先手泽遗惠的需要,也是保存乡邑与民族优秀文化的要求。所以,当张元济将目光投向乡邦文献的汇辑与刻印时,他就不能不对家族的著述与收藏率先予以整理。对于这项事业,他在致朱希祖、王甲荣、刘逸甫、刘逸樵、刘锦藻、刘越如、张沿勋、周庆云等人的书信中,不但表示了他要完成这项任务的心愿,还具体陈述了他的一些工作思路,并向对方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如在1921年7月9日致信王甲荣时就说到:“先给谏疏草流传极稀,弟访求数十年,只得一部。故亟亟翻印,庶先臣立朝大节不致湮没。独恨元济不肖,不能仰承先志,朝拜一疏,夕遭斥逐,致君无术,驯致沦亡,愧对君亲。”1924年3月4日又致信朱希祖说:“《茗斋诗初集》为弟族祖春溪公官甘肃徽县时所刻,同时尚刻《射山诗选》,见诸家乘。《射山诗选》弟已觅得,而《茗斋诗集》则未之见,乞借阅,拟印入《涉园丛刻》中,想蒙见允。”在张元济的多方努力下,最后辑成了《张氏艺文》、《涉园题咏续编》等家族文献。1911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重新排印了《海盐张氏涉园丛刻》7种,1925年影印《横浦文集》,1928年出版《海盐张氏涉园丛刻续编》7种,该书牌记题:“海盐张氏托上海商务印书馆用活字排印,于民国十七年四月出版”。张元济的“祖德陨坠”之忧^③,庶几免矣。

张元济对所汇集到的乡邦文献和家族文献,都进行了比较认真的整理和比勘,写出了68条题跋,现被辑入《张元济古籍书目序

跋汇编》中。根据他当初的计划,这些文献包括后来补辑的部分都是要刻印出版的^⑭。但是,《樵李文系》这部由张元济亲笔抄写目录,共收作者 2354 人,文 4041 篇的文集和部分其他海盐文献似乎未能出版。^⑮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他早年陆续收集的各种乡邦文献与家族文献,原来都庋藏于东方图书馆,1941 年他主动提出将这批先哲遗著,捐赠给新建立的上海合众图书馆。该年 4 月 23 日他给合众图书馆的主持人顾廷龙先生的信中说:“曩弟搜辑嘉郡先哲遗著,多历年所,亦积有数百种。去岁曾为兄言,拟归之合众图书馆,俾免散佚。不意冬间一病,侵寻数月,遂致久延。各书本积存东方图书馆所赁市楼,今当陆续取回,呈诸左右。今日先送去第一批,以后当排日检奉。惟中有蠹蚀者,如不便收拾,则竟弃去可耳。七邑之中以海盐人著述为多,鄙意拟暂时留出,冀异日敝邑或有图书馆之设,则仍以归诸故土,稍助乡邦文献之征。”自 1941 年 4 月 23 日至 7 月 31 日,前后共 20 次送去乡贤遗著 476 种,1622 册。海盐先哲遗著 355 部,1115 册,以及张氏先哲遗著及刊印、评校收藏的图书 104 部,856 册,及石墨、图卷各 1 件,暂存合众图书馆,拟在日后海盐建成图书馆时领回。由于海盐沦陷等原因,张元济将这批书永远捐赠给合众图书馆^⑯,供人民大众阅览。这正如张元济所说:“拾遗补阙,文献有征,正不仅一乡一邑之光也。”^⑰

三、肯定族谱的价值、襄助族谱的修纂

族谱或家谱是中国一种更具地方性和个性化特点的文献,由于它多出于一般的普通文人之手,其中又难免穿凿附会的现象,所以,对于它的价值,学者文人多不看好。但是,张元济对此却有他自己的理解和主张。

张元济首先比较准确地把握族谱的文献价值,利用其来解决家族和地方文献的问题。他在汇辑桑梓著述时,就注意到了嘉兴、

海盐以及本家的宗谱内容。1921年9月4日,他致信王甲荣谈及搜集乡邑著述时,就特别指出:“郡中旧家谱所载传志、家训之类,多可采者,务乞留意。”同年11月23日在致吕在廷的信中,他又说:“邑中诸大家必有家谱,其中传志碑铭均可采录”,“近借得万历《崇德县志》及州泉《吴氏宗谱》,颇多可采之文。”1921年8月8日致信陈瀛客,明确地将“旧家谱乘”列为乡邑文献的搜集范围。1927年1月30日致信朱希祖说:“邳架近得乡贤遗著多种,《沈氏支谱》其家不知在城在乡?起讫在何时代?尚祈见示。”人们通常认为家谱中暗藏着不少虚假的信息,但是,在记录明清以来本族人的著述情况时,则一般不会出现伪托增饰的问题。也许张元济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汇辑家族艺文时就提倡使用家谱的记载。这是一种非常科学的对待文献的态度。这种态度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家谱的价值仍然很有启发。

张元济不仅准确地使用族谱文献,还直接参与或襄助家谱的修纂。他曾经为《奚氏宗谱》、《尤氏宗谱》、《朱氏宗谱》和《滕县生氏族谱》作序^⑧,赞颂各族的悠长世泽,敬叹修谱者的文化功绩。他甚至认为近代以来受到严重动摇的宗族制度,“尤赖谱学昌明”^⑨。张元济为这些族谱写序的过程,在他给尤春欣、张国淦等人的书信中,都有交代。其中,为《尤氏宗谱》作序还曾出现了一些波折。1944年9月2日,张元济写给张国淦的信中说:“常州尤氏新印族谱嘱弟撰序,据称某日过访,适弟午睡,当将所携族谱二册交与一小姑娘云云。遍询家人均不知此事,或系误送尊斋。”同年10月18日又在给蒋维乔的信里说:“尤君春欣日前来寓见访,晤谈逾刻。……嘱撰谱序,亦已脱稿缮正……《尤氏宗谱》门类甚繁,不易赅括,弟不敢苟率从事,有负雅命。竭两日之力,写成七百余字,或不至为羊公之鹤也。”可见,为《尤氏宗谱》作序,张元济是非常认真地去完成。这更显示了张元济对族谱这种文献的恭敬之心。

作为海盐望族之后的张元济,对他的自家族谱当然也怀有特

殊的感情。他曾经在家乡寻访本族族谱及各房的后裔,结果发现族谱多已不存,且许多人都不知自己世系辈分。于是,他就给族人写信,请托三件事情:“一拟请在宁访求宗谱;二请探问移居长安之两房现时尚有何人?是何名号?操何职业?寄居何处?三除移居长安以外,有无同族之人?”^①。表明了他对本族家谱的关注。后来,当他听说堂兄张元勋续修家谱,他就写信表示支持,并答应亲自核校:“族谱尚未复校,在沪事忙,拟到京后稍暇可以埋头整理。”^②张元勋续修的这部《海盐张氏族谱》在上海图书馆有藏,《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著录该谱共十卷,卷首一卷,附录一卷,于1934年刻印。这距离张元勋完成编修又是十二年之多。这或是由于战乱等其他原因,或是张元济又做了非常实在的复校。张元济对族谱的重视态度,可见于他1949年10月17日的日记,其中记到:“潘光旦来访,予扶杖而行,谈收罗谱牒事。”潘光旦是我国著名的优生学家,他在研究优生与家族的关系问题时大量地使用了族谱资料,最有代表的是其《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一书。他专程拜访张元济,商谈收罗谱牒之事,表明张元济此时仍对族谱这类文献很感兴趣,非常关注这类文献。

张元济对族谱文献的关注和热爱乡邦的情操,使我们联想到与他有着很深交往的顾廷龙先生在解放后积极收藏家谱,从而使上海图书馆的家谱馆藏跃居国内外之首,我们猜想,这也许就与张元济有着某种联系吧。

注:

①《涵芬楼烬余书录·序》,《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中册),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45页。

②《张元济书札》,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272页。以下凡已说明致函主人及日期的,不再一一注出。

③王绍曾:《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6-37页。

④《张元济日记》(下)第976、99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以下凡已

指明日记日期的,不再一一出注。

⑤汪家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8页。

⑥《续修滕县志序》,《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93页。

⑦《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牋》,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97页。

⑧张人凤:《智民之师——张元济》,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第139页。

⑨何炳松:《商务印书馆被毁记略》,载《东方杂志》第二十九卷4号。

⑩曹冰严:《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图书馆九十年》,第28页。

⑪参见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5页。

⑫张元济:《排印本〈海盐张氏涉园丛刻〉跋》,《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下册),第1084页。

⑬张元济:《排印本〈张氏艺文〉序》,《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下册),第1086页。

⑭张元济1921年8月14日致信王甲荣说:“此书(按指《樵李文系》)将来必用雕版,冀与《诗系》相辅而行。”

⑮据张人凤“《樵李文集》续辑始末”称,文集稿本分订78册,现藏上海图书馆。《张元济轶事专辑》,海盐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年,第163页。

⑯张学继:《出版巨擘——张元济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1页。

⑰1921年8月25日致钱绍桢函,《张元济书札》,第901页。

⑱⑲《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01-307页。

⑳1922年致张慕旭信,《张元济书札》,第731页。

㉑1921年6月27日致张元勋信,《张元济书札》,第686页。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